

董健文集

卷二·文学评论



人文出版社



董健文集

卷二·文学评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健文集. 第2卷, 文学评论/南京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0960-9

I. ①董… II. ①南… III. ①董健—文集②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C53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6972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刘 宇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8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页 1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960-9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 | |
|------------------------------------|-----|
| 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 |
|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回顾 | 1 |
| 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 | 21 |
| 商品经济和失魂落魄的文学 | 48 |
| 新式读书人与文学研究的现代性 | |
| ——在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诞辰百年学术会上的讲话 | 54 |
| 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的 | 60 |
| 找回历史感 | |
|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问题 | 63 |
|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 76 |
|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 97 |
| 论 1956 年至 1957 年中国文学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 103 |
| 关于十七年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 | 127 |
| 告别“评论缺位的时代” | 143 |
| 当代文学的“时代病”：虚假与平庸 | 150 |
| 论“反修防修”文学 | 153 |
| 江苏短篇小说五十年 | 163 |

| | |
|---|-----|
| 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成就和败笔 | 174 |
| 论《红旗谱》的艺术价值和该书一九七八年版修改本的 失当 | 196 |
| 谈《内奸》的艺术构思 | 226 |
| 论陈白尘的小说创作 | 233 |
| 笑着告别那荒谬的年代 ——读《云梦断忆》 | 261 |
| 写出农民心灵的奥秘 ——读《李顺大造屋》 | 265 |
| 关于田汉早期文艺思想的札记四则 | 272 |
| 再论田汉早期的文艺思想 | 291 |
| 田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 312 |
| 从田汉看抗战文艺的伟大精神 | 321 |
| 《废都》:感伤与沉沦 | 329 |
| 说宋词其人与其文 | 334 |
| 对《大秦帝国》的质疑 | 346 |
| “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 ——对《大秦帝国》的再质疑 | 357 |
| 再谈《大秦帝国》的“反动性” | 368 |

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回顾

“启蒙”是个很老的话题——在中国至少已经谈论了一百多年，尽管在文化上煮了不少“夹生饭”；但又是个很新的话题——它的任务远未完成，直到当前仍然关系到我们所面临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精神领域的一系列迫切问题。人们的双脚走在现代化道路上，脑袋里（甚至生活行为中）却满是“秦政制”和“中世纪”。知识分子以不同方式蜕变着、败落着。文化的危机，教育的腐败，文学创造精神的萎缩，都掩盖在虚假繁荣的“热闹”之中。“中西合璧”的新儒学、“中国化”了的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他们与政治守旧势力结成看不见的“统一战线”，对抗历史进步，搅乱文化价值，共同制造着当代蒙昧主义，使我们周围弥漫着新的愚昧与无知、傲慢与偏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们越来越不无焦虑地感到，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补上启蒙这一课。

启蒙之要义是破文化专制、反思想垄断，其核心价值是人的自

由。所谓“人的觉醒”也由此而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要从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说起,它具有无可争议的伟大历史功绩,它所创造的价值原则是属于全人类的,绝非仅仅是某一阶级、某一民族的“私货”或“国产”(恩格斯晚年的观点及北欧社会主义模式就足以证明)。历史的“现代期”与人的“现代化”在更大的普遍性上正是以此为精神起点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也不敢与这些“原则”背离,而是想使新学说“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培尔、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大旗,与专制统治下的普遍蒙昧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们宣称,“理性”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裁判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尺度。“理性”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世俗的也好,宗教的也好;自然的也好,社会的也好;既有的一切“权威”都要接受“理性”的无情审判。他们强调,由于政治上的专制统治者和教职人员长期的愚民教育,民众普遍处于愚昧和苦难之中。如今,必须像太阳融化坚冰一般,让“理性”之光驱散民众思想上的蒙昧、昏暗,让“理性”之光照亮民众的头脑和心灵。投身于这一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对人性 and 人的“理想本质”做了严肃认真的研究,都极力强调人在现实世界的“主体性”。由于肯定人在现实世界的主体地位,看重人本身的个性与自由,一系列关于人以及人与社会、人与政治之关系的现代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得以产生。诸如人权、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博爱、宽容,以及法制、公正、个人主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等,都是这一启蒙运动的产物。以这些现代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为保证、为动力,也以它们为标志,欧洲真正走出了中世纪而步入“现代”,并首先

^① [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页。

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欧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观念随后向全世界扩散,启蒙的光芒一步一步地将其他愚昧、黑暗的地域照亮。人的现代化带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不妨说,现代化的世界正是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人类从欧洲启蒙运动所受之惠,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是过分的。

如果从整个世界着眼,人类正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一方面,欧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观念还远没有覆盖所有应该被覆盖的地方,欧洲启蒙运动的光芒还远没有驱散所有应该被驱散的黑暗;另一方面,在启蒙运动的故乡欧洲,启蒙运动却正在经受质疑,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冷峻地反思。而像中国这样的所谓“发展中国家”,情形则更为困窘:一方面,中国在各个方面还远谈不上是一个充分现代化了的国家,欧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观念还远没有在中国全面地落地生根,我们仍然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崎岖之路上蹒跚跋涉,欧洲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启蒙”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现代化不可绕过的一步;另一方面,源于欧洲的种种质疑、反思启蒙运动的理论也进入中国,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扎根”。欧洲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用自己的头脑在欧洲的语境中质疑和反思欧洲历史上已经完成并取得伟大成果的启蒙,而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式地在中国质疑和反思中国现实中几经阻断、艰难进行、从未充分实现的启蒙。有人将这种人的赶时髦讥为“饥饿的乞丐学富人节食”。这几年我国冒出的所谓“解构启蒙”、“启蒙的陷阱”之说,就是这么来的,他们虽然打的是“后现代”、“后殖民”一类的旗号,实际上充当了“前现代”反启蒙顽固派的“同路人”。

从整个世界着眼,人们会看到启蒙的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处在中世纪或类似于中世纪的状态。在这些地方,专制统治给人民的身心都戴上了重重镣铐,恐怖是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万马齐喑,道路以目,秘密警察的鼻尖甚至伸进每个人的卧室;

在这些地方,暴君以强权维持对自己的“崇拜”,暴君的生日是全民最盛大的节日,甚至人民也真的盼望这样的节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日子里,才可能吃上一块水果糖、半块巧克力;在这些地方,暴君口含天宪、为所欲为,即使有所谓的法律,也不过是统治者手里的泥团,任意地令其忽圆、忽扁、忽长;在这些地方,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和人民的啼饥号寒形成鲜明的对比,少数统治者生活得令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人也望尘莫及,而人民则是供养少数统治者的“蚁民”;在这些地方,人命如草芥,杀戮和死亡、鲜血和白骨是惯见的景象;在这些地方,上述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还是人民听不懂的话语,也被统治者视为最危险的“邪说”;在这些地方,专制的“铁幕”顽固地阻挡着启蒙的光芒;在这些地方,欧洲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启蒙,还是最严重的犯罪,因而也将遭到最严厉的惩处;在这些地方,即便偶有启蒙之光亮起,也像在如磐暗夜中点燃一根火柴,迅即熄灭,也如在万丈深坑里投入一丝火星,了无声息……当然,这些仅是种种极端的状况。还有更广大的地区,则是处于一种既非中世纪又非现代的中间状态。在这种地方,最时兴的和最腐朽的,最文明的和最野蛮的,最朝气的和最没落的,共存于同一时空,甚至共存于同一个会场、同一间客厅;在这种地方,自由和民主、法治和人权,是可以呼喊的口号,但仅仅是一种口号;在这种地方,专制不再赤裸裸而是穿上了迷彩服,而腐败则脱去了伪装赤膊上阵;在这种地方,社会生活的底线已被全面突破,在利益的驱使下已没有什么事情是人所不能为的;在这种地方,既得利益者紧紧抱成一团而民众则如一盘散沙;在这种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非驴非马、不三不四,并且不死不活……

尽管我们坚信,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欧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价值原则还有待普及,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对启蒙运动的任何一种严肃认真的质疑和反思,都是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的。在这个问题上,辞世未久的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

亚·伯林说过的一番话对我们颇有启示意义：

……我之所以关注维柯和赫尔德，从根本上说，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理性主义者。启蒙运动的价值，也即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些人所提倡的东西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于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把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因此，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是，他们是教条主义的，他们的做法也过分简单化了。我之所以重视对他们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批评意见，是因为我想，理解反对意见能磨炼我的鉴别能力，机灵和聪明的论敌常常能挑中启蒙运动思想中的谬误和错误的分析。我更乐于读那些对启蒙运动挑错指瑕从而增进见识的抨击，而不想看那些简单地重复和捍卫启蒙运动思想的老生常谈。……我不赞同更不欣赏那些启蒙运动的敌人的观点，但我从这些言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有些中心概念，推理水平，特别是他们有些政治推论，看来是不准确的，有时甚至是非常错误的。^①

人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一认识本身就是启蒙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启蒙运动中确立的种种信念和原则，当然也不可能是不容置疑和反思的绝对真理。既然一切都要接受理性的审视，启蒙运动自身也可以是后人运用理性审视的对象。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中国的“假洋鬼子”们那种非科学、非理性的、“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式的质疑和反思。

^① [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启蒙”，就是去掉蒙蔽，叫人明白。从语义学上说，作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现象（或曰文化现象），“启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合乎人性的文化欲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作为一个引起了精神领域的革命，推动了人和社会之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启蒙，却是指上文所说的欧洲那一次。“启蒙”一语，本为中国所固有。《易经》有“发蒙”（发者，启也）之说，汉代应劭《风俗通义》曾提到“祛蔽启蒙”，《三国志》里叫“启矇”更加形象，都是去掉蒙蔽、叫人明白的意思。但我们今天在现代思想文化运动意义上所使用的“启蒙”这一概念，同“革命”、“经济”、“政治”、“文学”等众多用语一样，又可以说是一个从日本输入的外来词。当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遭遇法语的“Lumières”、德语的“Aufklärung”或英语的“Enlightenment”等含有“照亮”之意的概念时，他们想到了汉语中的“启蒙”二字，于是便将这个西方概念译成“启蒙”。应该说，这个翻译是颇为传神的。

作为西方概念译语的“启蒙”，又从日本输入中国。日本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为“逆输入”。“逆输入”中国的“启蒙”，当然具有了与汉语中原有的纯工具性“启蒙”不同的意义。与西方意义上的“启蒙”同时输入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确立的“理性”与种种现代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于是，启蒙之火，也开始在这块有着两千年专制史的老大帝国的土地上燃烧。梁启超们是第一代盗火者，也是第一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放火者。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则是第二代盗火者和放火者。启蒙之火，在第二代盗火和放火者手里，燃烧得更其熊熊。“五四”时期的冲天烈焰，就是第二代启蒙者的杰作。按写文章的惯例，我们在这里应该罗列一番两代

启蒙者的丰功伟绩,列出一个长长的著作、理论、作品的清单,但这又难免成为前文提到的伯林所讥讽的那种“简单地重复和捍卫启蒙运动思想的老生常谈”。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伯林在做出这种讥讽之前,自己也稍稍“重复”了一下“捍卫启蒙运动思想的老生常谈”。在这里,我们不妨依照伯林的句式,对梁启超、陈独秀等两代中国启蒙者做一次“捍卫”: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试图把中国的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并且取得了可观的胜利。因此,我们站在他们一边。

虽然是仿照伯林的句式,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我们对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捍卫”,与伯林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捍卫”,在用语上有微妙却又重要的差别。这两次启蒙运动,并不是完全可比的。而最大的不可比处,不在于时空的巨大不同和理念的某种相异,而在于后果的两样。欧洲启蒙运动尽管当初也不乏阻力,但毕竟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西方世界大获全胜。而中国的启蒙运动,比起欧洲来,要艰难曲折得多。从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的启蒙努力,尽管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但还远远不能与欧洲启蒙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时间虽然过去了百来年,但在最基本的方面,启蒙先驱者心目中的目标,还仍然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所以,当伯林说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时,我们却不得不将“胜利”一词置换,而写成“殊死的战斗”。启蒙之路在中国之所以远比在欧洲要崎岖坎坷,与启蒙思想是一种外来之物当然有重大关系,但这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也不能说是决定性因素。而且也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全无与西方启蒙相通的文化资源。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专制的历史特别漫长,专制的机器经长期锻造而特别牢固、细密,专制文化特别发达而善治人心,以致人的思维方式也相应形

成了某种“惯性”，这才是使得启蒙在中国特别艰难的关键性因素。有位中国当代学者说，中国专制的历史漫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专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话是十分精确的。

专制的历史特别漫长，专制的根基特别深厚，使得中国的启蒙特别艰难，这是客观事实。但如果启蒙运动开始之后，便能克服一个个困难而持续地进行，百来年过去了，成效当然也会很可观的。但不幸的是，百来年间，启蒙真正得以持续进行的时间并不算长，它动辄被阻断，其中教训多多，值得总结。最值得汲取的一个教训是：统治者阻断启蒙浪潮、扑灭启蒙火焰的最佳武器是“国家至上”与“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国家遇到外敌威胁时，这种武器使用起来更加顺手而轻便——谁不爱国！谁不怕种族灭绝！上述启蒙理性的一切原则和价值，均可在“民族大义”的召唤下暂时搁置或抛弃。只有在这一“逻辑”之下，“救亡”才可以压倒启蒙。1949年以前，尤其是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入侵我国时，不能不说“救亡”对启蒙运动是会构成冲击的。关于中国现代史上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不少研讨，种种观点这里姑且不论。在此只想说，最早敏锐地觉察到“救亡”将会给统治者冲击启蒙提供“合理逻辑”的是鲁迅。1936年秋，救亡运动正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救国会”在上海滩上活跃着。而鲁迅却于此时写下了这样一番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①让大家明白“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是“民族大义”，是救亡；让大家明白“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是呼唤自由、民主，是启蒙。这二者本来不必构成冲突，而且站在启蒙立场上看，应该是高度统一的——中国的现代启蒙

^① 鲁迅：《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7页。

运动本就是为了民族自救,为了面对西方现代化强势不落后而掀起的,而且由启蒙了的公民组成的“人国”当然比奴隶组成的“沙聚之邦”更有抵抗外侮的力量。胡适说得更直白(也更为彻底、理想化):“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着重号为原有)^①但当“人国”未立、外敌已来之时,“国家至上”、“民族大义”就是一切,救亡与启蒙就悲剧性地冲突起来了。在此之前,鲁迅这一类启蒙者孜孜不倦地想让大家明白“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而当救亡运动兴起后,铺天盖地的文章和此起彼伏的演讲,都在告诉大家“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鲁迅分明感到,在这救亡声中,“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不但被忘却、被抹杀,而且不知不觉间,让大家产生了“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意念,从而不惜以血的代价换来“做稳了自己人的奴隶”的时代。在救亡大潮中,鲁迅是执着地坚持启蒙的。当然,这时间很短暂,因为鲁迅不久即与世长辞。在救亡大潮中坚持“五四”启蒙精神的,当然不仅是鲁迅,陈独秀、胡适等,都没有因救亡而放弃启蒙。

救亡对启蒙的冲击虽然强有力,但毕竟不能对“五四”启蒙精神构成致命打击。从价值理念上与“五四”启蒙精神根本对立的是与国家权力之争直接联系着的右的和左的两股政治势力。右的方面是国民党中的顽固守旧派和复兴儒学的文人,如蒋介石、陈立夫 1934 年发动所谓“新生活运动”,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 1935 年联名发表宣言,提倡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但这股势力反启蒙的理论和实践均收效甚微。左的方面是共产党的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在救亡声中发起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它才从价值理念上对“五四”启蒙精神进行了有效阉割和否定。1936 年 9 月,正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0 年版。

当鲁迅因“五四”启蒙精神被救亡所冲击而忧心如焚时，陈伯达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呼吁：“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并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第一步，是“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紧接着，陈伯达又在《新世纪》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强调：“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接。”在这篇文章中，陈伯达特别指出“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差异之一，是二者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哲学基础”是“形式逻辑”，而“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则是所谓“动的逻辑”。陈伯达将“新启蒙运动”的喇叭吹响后，张申府、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纷纷撰文响应。于是，所谓“新启蒙运动”就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陈伯达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资格发动所谓“新启蒙运动”，是因为自己乃“新哲学家”。而所谓“新哲学”，就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至于陈伯达张扬的所谓“动的逻辑”，则是所谓“辩证逻辑”。一九四九年前，“新哲学”指导下的“革命”与人民的民主要求是同步的，所以他们打出“新启蒙运动”的旗帜时，仍宣称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继承。但从根本的价值观上说，他们是要对“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清算，是要以一种新的理念全面取代“五四”启蒙理念。在他们看来，“五四”启蒙运动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启”所谓“封建主义”之“蒙”，因此，是把人们从一种“蒙”带入了另一

种“蒙”。而“新启蒙”则不但要“启”所谓“封建主义”之“蒙”，还要“启”那“五四”启蒙运动所造成的资产阶级之“蒙”。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启蒙和陈伯达们发动的“新启蒙”，与其时的救亡运动有着不同的关系。“五四”启蒙坚持“个人”价值，与群体的、政治化、军事化的救亡，的确有着内在的冲突。当鲁迅满怀忧虑地写下上述那番话时，他分明感到了面对这种冲突的无奈。而陈伯达们的“新启蒙”，就“新”在非“个人”尚“集体”，无视启蒙固有的价值理念，当然就毫不费劲地与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了。甚至可以说，不是他们的“新启蒙”来救国，而是“救亡”的历史机遇“救”了他们的“哲学”和“革命”。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以“哲学”的方式“救亡”，即巧妙地把救亡运动变成一场宣传和普及“新启蒙”的运动，而且做得极为成功。当救亡的强风吹起时，陈伯达们不失时机地点燃了“新启蒙”之火。于是，这“新启蒙”之火，便乘救亡之风而熊熊燃烧。当救亡之风与“新启蒙”之火相拥抱时，“五四”启蒙的精神和思想，就被践踏、被凌辱、被打入冷宫。所以，正是救亡与所谓“新启蒙”联手压倒了“五四”意义上的启蒙。这从抗日时期文学思潮的变化，就看得非常清楚。当然，“五四”意义上的启蒙与陈伯达们的“新启蒙”还有一个十分重大的差别：前者仅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对国民进行文化心态塑造的一种思想文化活动，是精神领域的一种“先觉觉后觉”，启蒙者所使用的“武器”只是“笔和舌”。而后者，则是一个武装了的政党对民众进行政治导向的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决心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政党在从事政治宣传，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在笔和舌之外，更有刀和枪。

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新启蒙”，作为一个武装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以血与火开路的“新启蒙”，当然会随着它所附着的政治军事力量的胜利而胜利。1949年以前，在这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统辖的地区，“新启蒙”已压倒“五四”意义上的启蒙。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在整个大陆地区，“新启蒙”所推崇的一整套理念

和价值体系占据了统治地位,随之“启蒙”的话语,无论新旧,也就全被抛弃了。当然,政治军事的胜利,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思想文化的胜利;对土地的占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精神的控制。一九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要他们“交心”,“脱裤子,割尾巴”,就意在彻底清除“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让“新启蒙”的一整套理念全面占领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直至发动“文革”,在二十世纪的东方复辟了黑暗的中世纪。

“文革”结束后,“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才开始复苏。1980年前后在哲学界、文学界冒头的人道主义思潮,可视作是“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复苏的一种突出表现。但这种复苏并非一帆风顺。1983年,以“清除精神污染”命名的闹剧,就意在对这种复苏的“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进行再一次的“清除”。在这一闹剧中,周扬之所以成为牺牲品,就是因为他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稍稍向真正的“五四”启蒙精神回归一下(譬如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异化”,在政治领域使民主变为“主民”即专制,在思想领域使个人迷信、奴才哲学盛行,“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抹杀)。胡乔木的署名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①,是最蛮横最强暴的一根大棒,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伯达“新启蒙”在八十年代的新表演。胡乔木在文章中极力批判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极力批判了“人是目的,人是中心”这种理念,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需要”等种种说法予以了粗暴的否定。今天看来,胡乔木的这篇文章逻辑之混乱、观点之乖谬,是不待智者而后知的。按照胡乔木的逻辑,今天的“以人为本”这句政治口号,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精神污染”的严重表现,都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① 刊发于《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